互聯網的內容審查與 網絡亞文化

五浅器

作為一個網絡媒介事件,「草泥馬」事件始於2009年初「百度百科」中「十大神獸」的出現和1月5日開始的國家「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①(下文簡稱「反低俗行動」),至今餘波未平。在近五個月的時間裏,從一個由「經典國罵」諧音演變而來的虛擬文字能指尋找到羊駝這一所指開始,圍繞這一南美洲生物生產出的各類文本(故事、漫畫、視頻、玩具、T恤、造字),使得這一事件成為迄今為止中文互聯網「語言抵抗」現象中的空前個案。

在「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草泥馬」這一連串網絡事件的語言生產序列中,不同於前幾者的是,「草泥馬」和「十大神獸」在出現之初並不針對某一具體的網下公共事件②,最初只是被網絡亞文化群體——ACG愛好者③——生產出來並「自娛自樂」。但在隨後的文本旅行中,經歷了各種群體一系列意義改寫整合的再生產和再命名後,「草泥馬」文本群成為了一個文化現象和社會心理載體,獲得了民間、政府、學界、傳媒的廣泛關注和介入。

從傳媒理論的視角出發,文本的傳播過程也就是層層疊加的闡釋過程,亦即文本的「原意」被改寫、遮蔽、佔用的歷史。隨着反低俗行動的深入,大量政治和非政治網站的關閉,使得本屬於不同訴求和利益的群體共同加入到對「草泥馬」相關文本的使用和再生產中。長期關注中國互聯網內容審查的學者蕭強認為:「絕大多數的網民已經加入進來,無論是嚴肅的學者,還是那些平時政治冷漠的都市白領。這表明,它所引起的共鳴是多麼強大。」④

本文試圖梳理和闡釋中國互聯網的政府審查、網絡語言與亞文化、反審查 等之間的複雜關係,以期對這一事件中文本生產的內容表達和主要生產主體的 流變做出有效的理解,進而分析在這一過程中各個群體對意義的爭奪和喚詢過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媒介轉型的機理、意義與管理——以網絡媒介事件為例」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本文的主體部分是在北京大學新聞與 傳播學院吳靖副教授的指導和討論基礎上完成的,特此致謝。 「草泥馬」最初只是 ACG愛好者生產出來 並「自娛自樂」。系列 養改寫整合的再生產 和再命名後,「可 文化現象和社會可以 就體,獲得了民傳媒 政府、學界、傳媒 廣泛關注和介入。

程、文本原意被佔用和改寫過程,以及在這一從「世俗性」向「政治性」轉化的過程中一種作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的建立。

一 作為信息戰場的中國互聯網與內容審查

2010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 發布的〈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人,普及率達到28.9%,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規模較2008年底增長8,600萬人,年增長率為28.9%⑤。在這組數字中,網民規模、年增長率和增長人數均達到世界第一。相比較而言,人口與中國相當的印度,上網用戶只有2,400萬。中國網民規模的迅速增長,得益於政府在網絡基礎設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資⑥。

互聯網在中國的快速成長使得政府處在一種兩難處境⑦。在支持互聯網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國家現代化手段的同時,政府又試圖對網上傳播的內容進行控制。並且,僅僅在內容控制方面,政府依然處於一種模稜兩可的狀態:一方面想要獲得網絡作為開放平台對抗保守政治哲學的價值,另一方面又要消除互聯網作為自由平台沉積社會不滿和破壞力量的天然屬性®。正是在這樣複雜的語境下,互聯網已經成為了中國「信息政治」的戰爭前線⑨。2005年4月,由哈佛大學法學院、劍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共同組建的開放網絡促進會(OpenNet Initiative)發表的一份關於中國網絡封鎖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的網絡過濾系統是全世界最發達的。比起其他有些國家的類似系統,中國的網絡過濾系統是全世界最發達的。比起其他有些國家的類似系統,中國的網絡過濾範圍廣,手法細緻,並且效果顯著。整個制度包括多層次的法律限制和技術控制,牽扯到眾多的國家機構,以及成千上萬的政府職員和企業員工。」⑩

自1994年以來,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先後制訂了多項旨在控制互聯網服務、內容、表達行為的法律。在審查措施的具體技術手段方面,GFW (Great Firewall,即中國國家防火牆) 成為網民對網絡審查系統的通用稱謂。這一系統旨在用於過濾境內用戶對於互聯網內容的訪問,而過濾是中國政府用來阻止用戶訪問海外網站敏感內容的首選措施。對中國境內網站所含的敏感內容,則通過政府對網站運營商進行某種行政干預,使得網站通過多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自我審查和監管來實現屏蔽①。

不過,由於審查標準的模糊性(如對「有害信息」定義的模糊性),不同網站的審查尺度千差萬別,有的網站會使用比官方更嚴苛的標準審查並管理言論,有的網站則允許很多敏感內容和詞語的出現。總體來看,不論是官方還是網站,對於色情內容的審查力度要遠遠小於政治敏感類內容。根據上述開放網絡促進會的報告,在中國大陸,不能登錄的色情網站只佔10%左右,也就是說,90%的色情網站可以登錄,但是要登錄疆獨、藏獨、「六四」等政治性網站則是幾乎不可能②。

政府對所謂「低俗」內容的監管不嚴格,某種程度上成為反低俗行動產生的 導火索。長期以來,帶有各種軟色情特徵的內容在中國互聯網世界處於一種暢 行無阻的狀態,普通商業網站大都將此類內容作為其吸引流量的手段,即使是 具有官方身份的「新華網」、「人民網」等網站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11月28日, 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曾對「百度網」與「硅谷動力網」單獨進行「曝 光與譴責」,指出百度網的「相冊」和「貼吧」欄目「含有大量低俗內容。該網站相 關工作人員接到舉報中心的通知後,拒絕整改」③。

一直以來,在後冷戰格局的背景下,對於中國互聯網審查,特別是對GFW 過濾敏感內容的關注,主要來自於西方的學者、政策制訂者、媒體和活動家。 鑒於中國國內互聯網上的敏感內容多被刪除和阻止出現,美國政府和許多希望 促進中國言論自由的非政府組織已經投入可觀的資源,用於向中國網民散播關 於翻越封鎖的信息⑩。在國內,已有眾多異見人士、媒體人士、技術專家等通過 博客等網絡媒體形式,不遺餘力地向中國網民傳播各種被戲稱為「翻牆」的技術 手段。

正是因為中國互聯網審查中長期存在對政治敏感性內容和色情內容審查的不同力度標準,西方對此關注的各方在對反低俗行動的闡釋中普遍認為,中國政府「掃黃為次打非為主」,實際上是藉整頓低俗內容之名對政治敏感性內容進行清洗。這種解讀框架從行動展開後2009年1月9日「牛博網」被關閉開始,逐漸放大。例如「BBC中文網」對反低俗行動進行的跟蹤報導中一再強調這一解讀框架。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3月12日題為〈一個雙關髒話嘲弄中國線上審查者〉("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的報導中,更是直接寫到,「『草泥馬』作為顛覆行為之一,是民間突破中國獨裁系統的一個例子。」⑩

筆者認為,這一事實恰好是中國處於某種「後冷戰時代的冷戰」現狀的例證。正是歐美世界採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冷戰姿態的各方,熱衷於「發現」、命名或嘉許中國「民間社會」的出現,並藉此顯現某種救世主與恩公的權力姿態®。西方傳統媒體對「草泥馬」事件的關注和命名,很快被關注中國互聯網審查的眾多意見領袖、博客和論壇轉載,而這種傳播通常同時伴隨了對翻牆知識的介紹和翻牆必要性的普及。可是,一直以來,由於中國絕大多數網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對網絡技術應用的陌生,翻牆技術的推廣一直局限在一個較精英化的網民群體中。像牛博網這種思想言論類網站的關閉,並不會給絕大部分中國網民的網絡生活帶來干擾。

然而,反低俗行動開始以來,國內網民的日常行為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擾」,在已經公布的九批網站曝光名單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國網民主要的日常網絡應用。特別是提供動畫、漫畫和遊戲類內容服務的網站大量上榜甚至被關閉,它們正是「草泥馬」這一文本的生產者——ACG愛好者——主要的日常網絡應用。恰恰是這種廣泛的干擾而不是所謂對政治敏感性內容的審查,使得對網絡審查持續高度關注的各方與中國普通網民的利益達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度

20 | 二十一世紀評論

共鳴。本文認為,圍繞「草泥馬」和「馬勒戈壁」上各種虛擬生物的「惡搞」文本的廣泛生產和傳播,正是體現了對這一共鳴進行的文化表達。而外媒對散落在互聯網空間各處的不同內容生產的聚合和命名,又尋喚出中國網民更廣泛的社會不滿情緒,以及更有目的性、更加集中的基於文本生產的發洩和狂歡行為。

二 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

審查 (censorship) 是指對某些初始信息進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鎖、管制與操縱的過程®。一種觀點認為審查是為了那些易受傷害的群體的道德與社會福祉;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審查不可避免地聯繫了權力與作者,有能力實施審查,就意味着擁有法律資格去解釋甚麼是恰當的、甚麼是不恰當的,從而對公共信息直接進行操縱與控制,同時也必然聯繫了弱勢群體的抵抗。這兩種觀點間的張力,在中國互聯網內容審查與網民的語言生產中充分凸顯出來。

審查最初通常會導致一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在互聯網中,某個群體的網民使用一種約定俗成的替代性詞彙來表達被網站屏蔽的敏感詞彙就是這樣一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在中國境內運營的網絡遊戲中,為消除遊戲中的人身攻擊和色情暴力內容,玩家的語言輸入受到運營公司的嚴格審查。用諧音或代稱來表達此類內容已成為網遊玩家的慣例,可以說,這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已經成為了這些群體應對審查的日常策略。「草泥馬」等諸「神獸」的名稱最早就是來源於第九城市旗下運營的網絡遊戲《魔獸世界》中眾多敏感詞彙遭屏蔽後的一種諧音替代。「草泥馬」這一神獸最早就來自於百度「魔獸世界」貼吧的內部語言,而那裏正是「十大神獸」最早出現的論壇。而這種因審查引發的另類語言在特定群體中的廣泛使用,又幫助建構了群體的亞文化身份認同。

ACG,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縮寫,是動畫、漫畫、遊戲(通常為電玩遊戲)的總稱。動畫和漫畫產業本來就密不可分,同時隨着電玩產業快速崛起。ACG愛好者作為亞文化消費族裔,是中國年輕網民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僅《魔獸世界》一款網絡遊戲在中國的玩家數量就已超過600萬。我們所熟知的眾多網絡語言,如「雷」、「萌」等均是被這個族裔最先轉引⑩和使用的。而由應對審查而產生的語言是這個亞文化群體語言生產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並幫助建構了其身份認同。從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這種語言實踐幫助亞文化群體在父輩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開創出一個有意義的中介空間:一個能夠發現,並能夠表達某種另類身份的認同空間⑩。

不過,這一文本生產和由此建立的認同空間並不具有天然的抵抗性。正如政治經濟學派對於文化研究的批判,這裏需要在抵抗和應付之間做出區分@。若將這種文化策略和「他者」身份建構視作一種逃避主義,則此種文化實踐反而有助於權力結構的維持。這當然正是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主題——廣為人知的

犧牲者與壓迫他們的權力體系共謀的理論。這不是資助這個群體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標準強加於他們的問題,而是對於系統性強制的認識——人們就是在這個系統性強制中建構文化應付的形式,也是對系統性強制如何阻礙了解放的認識②。可以說,如果沒有反低俗行動的出現和新的言說力量將文本帶離其原始空間,則「草泥馬」文本僅僅是幫助生產了一種「象徵性抵抗」的認同空間,而這種「象徵性抵抗」實際上是對現有秩序的一種應付。

因此,在「草泥馬」事件早期,「草泥馬」等眾多神獸在百度百科中的出現,可看作源於ACG愛好者這個亞文化群體的一次「違背我們期望的表達」,是從百度貼吧內部發出的對百度百科這一產品所代表的象徵秩序的象徵性挑戰,並以此獲得身份認同和僭越快感。「馬勒歌碧」、「臥槽泥馬」等詞條早在2008年就出現在百度百科中,「十大神獸」和「十大美食」等也均為與政治敏感無涉的髒話和色情語言的諧音創造而來。可以說,如果沒有反低俗行動和網絡對「草泥馬」文本群的傳播,這隻羊駝可能還只是「魔獸世界」貼吧中ACG愛好者自己的神獸而已。

致力於向西方報導中國流行現象的danwei.org於2009年2月11日對「十大神獸」的報導曾經引起了「魔獸世界」貼吧網友的震驚,跟帖中普遍認為「一個自娛自樂的對象竟然被老外也知道了,真是太丢人了」②。從該網站的報導開始,將神獸和「草泥馬」帶離其原始語境進行再命名的過程漸次啟動,而外媒對這一過程的啟動和傳播實際上反哺和刺激了這一被去語境化和再語境化後的「草泥馬」在中文互聯網世界的傳播。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草泥馬」事件的原始文本起源於ACG愛好者這樣一個政治冷漠的亞文化群體,與反抗中國政府內容審查之間並不存在先天的應對關係。但當「十大神獸」開始從AGC愛好者群體的封閉空間中擴散到其他互聯網空間時,隨着反低俗行動的強勢展開和各方反審查力量的介入,這種文本生產的抵抗性和政治性不可避免地湧現出來。

三 內容審查與文本抗爭

審查力度的變化給審查對象帶來的溝通不便所引起的不滿,往往會使這種被動的語言替代轉變為主動的圍繞這種替代語言的文本生產,以此作為一種抵抗形式來嘲笑審查的失效。而當審查涉及政治性內容時,往往會激發政治抵抗,引發某種創意以至於相當具有政治性見解的閱讀。帕特森 (Anna Patterson)就曾在其討論文藝復興時代的專著中,談及有許多藝術家通過某種心照不宣的語彙和意象,使讀者與作者產生共識,藉此透露國家與當政者的審查制度、機制性暴力如何使藝術家的創作過程產生壓抑和扭曲②。達恩頓 (Robert Darnton)通過對法國大革命前出版物的研究也發現,《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並沒有導致雅各賓主義 (Jacobinism),倒是地下非法流行的大量色情小說和政治笑話為革命準備了一種顛覆性的社會心態②。

同樣,在網絡時代中國境內的互聯網博客服務中,為了逃避博客服務提供商的內部審查,中文博客經常運用諷刺、委婉、文學典故、含糊,或者編碼的短語,甚至使用圖形來傳達批評信息會。而這種傳達方式,已經為中國普通網民所熟悉和熟練運用,以網民的戲謔式語言著稱的「網易新聞」跟帖是這種語言現象的集中體現。可見,審查制度與抵抗式文本生產之間的關係,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媒介載體中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而本文認為,這種網絡言說方式的流行,實際上孕育了一種被網民共享的顛覆性社會心態,但這一流行過程和心態的獲得,並不是如西方媒體所言的一個「自發的民間」的生長過程會。

在「草泥馬」這一事件的時間序列中,文本生產的過程經歷了從諧音語言(「草泥馬」)、到虛擬動物(各種神獸)、到神話故事(圍繞生活在馬勒戈壁上的「草泥馬」與「河蟹」爭奪沃草的敍事)、到「惡搞」視頻(《草泥馬之歌》、《馬勒戈壁上的草泥馬》、《動物世界》特別版等)、再到玩具的設計與售賣(雷雷、萌萌;馬勒、歌碧)。在這個過程中,一種創意的激發很明顯地展現了出來。然後,正如本文上一節所言,這種創意性的文本生產被看作直接的「政治抗爭」,實際上是經過了一系列第三方力量的加入與言説的結果,如2009年2月初「草泥馬」視頻的發布,2月20日國內公共知識份子崔衞平的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的發布②,前述3月12日《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3月20日政府封殺「草泥馬」禁令的下達,還有3月22日自由派學者、著名博客毛向輝製造的「草泥馬」新漢字的發布等等②。在這一過程中,這些無名和分散的對象獲得了命名、序列和意義。而這種被獲得的意義自然喚詢出了更多主動的基於這種意義的文本的生產。可以説,內容審查與「草泥馬」文本群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樣一種螺旋上升的過程中顯影出來。

在這一文本旅行過程中,抽離於原始文本的各種抵抗性闡釋的出現,實際 上再現了一種新的知識架構與文化社會分層。霍爾(Stuart Hall)使用「情境意識





「草泥馬」由粗話諧音發展成以羊駝為原型的虛擬動物(圖左),甚至是公仔的設計與售賣(圖右)。

形態」(situational ideologies) 這個術語來描述各種價值與意義對話語的積極介入。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正如一個個開放的意識形態場景,在那裏意義被爭奪、被改造、被挪用、被不斷地重新定位。對於傳播受眾的個體而言,解碼的過程實際上是依照一個人對所處環境的想像型理解,將信息符號放入它們之間及與其他符號之間的創造性關係中國。而互聯網中的受眾又可以被看作「傳受合一者」,他們的創造性解碼,實際上就生產了新的編碼系統,也就成為了新的言説力量。藍若宇就在這一視角下指出,中國互聯網中的「惡搞」文本,說到底是一場信息符號的「階級鬥爭」⑩。

正是這些言説力量的介入,對原始文本意義的穿透和疊加,實際上幫助喚詢和勾連了更普遍的社會心理。庫切 (J. M. Coetzee) 通過對當代南美文學的考察發現,審查制度所激發出的反諷與抵抗話語,反而是一種特殊的再現與表達模式,有力地重現了隱藏於官方立場背後的不合理現象®。從庫切的視角出發來理解中文互聯網世界中的網絡文本生產,同樣可以發現其中對於廣泛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現實的再現。從「草泥馬」事件後期網上流行的一份「主要神獸大全名單」來看,除了由早期髒話和色情語言的諧音創造的物種外,還有這樣一些物種②:

朵貓貓:一種人工繁育的變異貓科動物,性兇猛,多用於監獄等地的守衛工作。(「躲貓貓」,獄警打死人案)

打漿鼬:一種草原鼬鼠,以無所事事著稱。(「打醬油」,香港女明星艷照門事件)

公務猿:生活在河蟹聚居地的一種猴子,高級進化後可變異為蕩猿。

蕩猿:公務猿的高級變種,可製造並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鉦斧、井叉等。

卅克麒:原產法國的一種低級類龍生物。(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özy]的諧音,關於「反法」)

稿栗蚌:一種無腦蚌類,喜歡把一切可以看到的東西都收入自己殼裏。(關於「反韓」)

叁鹿:中國本土的一種珍稀鹿類,可產出名貴藥材紳傑石。(三鹿毒奶粉事件)

瓘狸猿:這個不用解釋了,一種受制於河蟹的生物。(「管理員」的諧音)

騬纜: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極強的破壞力,是河蟹的屬下。(「城管」的 諧音)

央蝨:蝨子的一種,習慣性把其他生物都當作鯊鼈,喜歡自焚。(「央視」, CCTV大樓起火)

韃癩瘌馬:一種紅色無毛的高原馬,是草泥馬的變種之一,又稱韃癩草泥馬。

股瓢: 瓢蟲的一種, 飛行能力極低, 起飛後無法自控, 直直下跌直至跌到底。

症懈萎猿:河蟹的跟班,盛產於全國各地。

甘鯨:井叉在長期鬥爭中產生的副產品。

我們看到,這些物種廣泛再現了近年來中國互聯網輿論中的主要議題,並 且這些文本已經不再是對內容審查的單純回應,而是成為了由內容審查和基於 「草泥馬」的文本框架激發出的網民更廣泛的社會敵意和不滿。

關於這種網絡文本生產的社會意義,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對東南亞農民的反抗實踐進行的民族志研究是可以借鑒的圖。這一觀點在「草泥馬」事件中,被清華大學學者郭于華通過博客的方式呈現出來。他指出,斯科特創造了兩個關於日常抵抗的概念:「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斯科特樂觀地認為,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爭奪的地帶——但並不是一堵結實的牆。通過「隱藏的文本」,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間,而這一社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所要達到的成就圖。

就「草泥馬」事件而言,這一社會空間的成立無法建立在僅僅是源於「弱者」 反抗的基礎上,或者説,這種作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為本身,就是其他一 些更具反抗性的群體給予命名的結果。更進一步説,政府作為審查行為發起的 主體,於2009年3月20日在監管系統內部發布了封殺「草泥馬」相關文本的指令, 但卻被《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公開地報導了出來圖。在這一過程中,對於「隱藏 的文本」的審查反而使得這些文本和行動本身被更明確地命名和建構;西方媒體 的報導又使得這種「隱藏的文本」可見化。可以説,被抵抗一方的行動恰恰進一 步促成了這一社會空間的成立。

四 綜述與結論

綜合以上對「草泥馬」事件的探討,本文認為,考察本次事件的文本旅行過程,從意義的建構、言説框架的流變和各方力量的作用出發,本次事件可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09年初「十大神獸」被首次報導和1月5日反低俗行動啟動開始,到2月20日崔衞平發表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在第一階段,主要的文本來自政治相對冷漠的ACG群體;文本意義中「草泥馬」文本群並未與反低俗行動建立直接的應對關係;網民對於文本的生產、使用和傳播還停留在「惡搞」、「自娛自樂」這樣的表述中;反低俗行動還一般僅限於對色情內容的封殺。但是,基於「草泥馬大戰河蟹」這一敍述的「惡搞」視頻已經出現並獲得了高點擊率,這些視頻成為了此後政治性抵抗表述的主要引用資源,而「十大神獸」這個真正的語境來源則在後來的發展中被抽離。

第二階段:從2月20日崔衞平發布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到3月20日「草泥馬」封殺令的下達。不同於第一階段,反低俗行動引起中國境內的「豆瓣網」對站內眾多政治性內容小組的關閉,直接導致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崔衞平發布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將反低俗行動與「草泥馬」直接確定為一種抵抗關係。這一

階段,可以被看做尋喚意義階段。「草泥馬」事件開始引起各方的關注,關注度隨着西方媒體的報導達到頂峰。《紐約時報》、《衞報》(The Guardian)、英國廣播公司 (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等西方主要媒體都對這一事件做了專題報導,且敍事的框架趨於一致,即「草泥馬」是對審查的直接抵抗和嘲弄圖。其中也有一些聲音強調西方媒體對這一事件存在過度闡釋。然而,3月20日網絡管理部門對於「草泥馬」的封殺,又可看作回應了西方媒體的這種闡釋,至此,「草泥馬」與內容審查之間的抵抗關係獲得了完整的話語表達和確認。對「草泥馬」文本的再生產,也由ACG群體轉移到政治敏感性和參與性更強的網民群體圖。亞文化和政治抵抗之間發生了某種構連和轉換。

第三階段:從3月20日封殺令下達開始,到4月11日《廣州日報》的報導——〈山寨漢字你認識嗎?〉圖。在這一階段,隨着各網站對「草泥馬」封殺令的執行和反低俗行動進入尾聲,「草泥馬」事件的關注度開始了持續的下降,但反對內容審查的社會空間已然形成,「草泥馬」被賦予的意義也相對開始固定了下來。由自由派學者兼博客毛向輝製造的由「草泥馬」創造成的新漢字成為了一個新的抵抗文本,並得到了迅速的傳播。

至此,事件的結果,像「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一樣,「草泥馬」成為了一個網民廣泛使用和再生產的流行語;然而,不同的是,在「草泥馬」事件中所體現出來的各方力量的複雜介入、對意義的命名和改寫、知識份子與公眾的構連、各種文本的大量湧現和廣泛傳播等特徵,都是前幾者所不具備的。還有,前幾種語言的創造和使用均源自公共事件,而「草泥馬」事件對於普通網民而言並不具有明顯的公共性,而是更多地聯繫到一種個人的切身利益的共鳴。「草泥馬」這一形象也從「神獸」演變為網民的一種自指,「草泥馬」與「河蟹」之間的戰爭的敍事,可以表述為「河蟹」對「草泥馬」自由生活的一種干擾和破壞。

北京大學學者胡泳認為,在後集權主義文化中,政治上的集權和經濟上的消費主義產生了一種奇異的結合。它鼓勵道德冷漠,庸俗,埋頭於個人的生機、消費和其他私人事務。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在中國同時滿足了人們參與和遠離政治的欲望」⑩。然而,本文發現,「草泥馬」事件的出現正是源於作為極權主義的內容審查對這些私人領域的入侵。我們看到,在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對於控制和自由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成為一種普世體驗的話語中,這種衝突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後極權主義文化中的不穩定性的基礎。但同時必須承認的是,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必須置於中國所處的「全球後冷戰」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和闡釋。

在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經典文本《儀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中,作者將一系列的青年文化風格詮釋為象徵性的抵抗形式,這些症候性的風格代表了更廣泛、更普遍、被掩蓋的不滿情緒,代表了整個戰後時期的特徵⑩。本文認為,從症候性的網絡亞文化風格到直接的文本政治抗爭的轉變是「草泥馬」事件中凸顯的特徵。在這一過程中,由審查所引發的回應、公共知識份子與西方

媒體喚詢的共同作用,是促成這一抵抗空間成立的基礎。儘管由於訴求和立場的不同,不同網民、學者、中外媒體等各方對於「草泥馬」文本的使用和生產遵循不同的框架,但最後都在「自由反對極權」這一框架下達到了某種共鳴,並以「草泥馬」文本生產的形式展現出來。正是在這一具有霸權性的共識中,娛樂和消費作為一種抵抗的社會空間在互聯網中得以成立。

對於這一個案中文本旅行過程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切近中國互聯網空間的 文化實踐與信息政治。對於中國互聯網空間的現實而言,考察其所處的全球政 治經濟場域,考察這種作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進而考察這種政治冷漠的 娛樂公眾向政治公眾、民主公眾轉換的可能性,為超越技術民主的樂觀和悲觀 主義之間的簡單二元對立,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

註釋

- ① 參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國新辦等七部委開展整治互聯網低俗之 風專項行動〉(2009年1月5日),http://net.china.com.cn/ywdt/txt/2009-01/05/content_ 2668979.htm。
- ② 如「俯臥撐」之於甕安事件、「躲貓貓」之於獄警打死人案、「70碼」之於杭州飆車 案等,均是直接源於公共事件的網絡文本。
- ③ 對於這一網絡亞文化群體的討論,參見本文第二部分。
- ④⑮❷ 參見Michael Wines, "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 ⑤ 參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0年 1月15日), 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10/1/15/101600.pdf。
- ◎ 胡泳:《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329;299。
- ① Guobin Yang,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6 (2003): 453-75.
- ® Eric Harwit and Duncan Clark, "Shap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 Asian Survey 41, no. 3 (2001): 408.
- Guobin Yang, "Activists beyond Virtual Borders: Internet-Mediated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al Politics in China",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no. 7: Command Lines: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Global Cyberspace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609/1524.
- ⑩⑫ 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
- ® Rebecca MacKinnon, "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First Monday* 14, no. 2 (2009),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
- ⑩ 參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對傳播低俗內容網站的曝光與譴責(第5號)〉(2008年11月28日), http://net.china.com.cn/qzl/txt/2008-11/28/content_2604476.htm。

[®] K. Oanh Ha, "Piercing China's Firewall: Hackers, Activists, Challenge Beijing's Internet Police", *San Jose Mercury News*, 2 July 2006.

- ⑩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頁33。
- 動 費斯克(John Fiske)等編撰,李彬譯註:《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34。
- ⑩ 這類詞語大多來自於日語,隨着日本ACG文化被引入。
- ⑩ 赫伯迪格(Dick Hebdige) 著,陸道夫、胡疆鋒譯:《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10。
- ❷② 加恩海姆 (Nicholas Garnham) 著,賀玉高、陶東風譯:〈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1-6。
- ② 参見Joel Martinsen, "Hoax Dictionary Entries about Legendary Obscene Beasts", 11 February 2009, www.danwei.org/humor/baidu_baike_fake_entries.php。
- ◎ 轉引自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27。
- ®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5).
- 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Below the Radar", Asian Survey 48, no. 5 (2008), 752-72.
- ② 參見崔衞平:〈我是一隻草泥馬〉(2009年2月20日),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23747.aspx。
- 寥 參見毛向輝:〈一個新漢字〉(2009年3月22日),www.isaacmao.com/2/2009/
 03/blog-post.html。
- 轉引自藍若宇:〈我們都是「惡搞者」:從文化的身份認同看惡搞〉,中華傳媒網學術網,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123。
- ⑩ 參見藍若宇:〈我們都是「惡搞者」〉。
- ⑨ J. M. Coetzee, Giving Offens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轉引自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頁27。
- 参見http://wp.chnits.com/2009/05/blog-post_7331.html。
- 3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❷ 參見郭于華:〈「草泥馬」:互聯網時代的「弱者的武器」〉(2009年2月25日),www.chinafolklore.org/blog/?uid-137-action-viewspace-itemid-5972。
- 参見Michael Wines, "China: Censors Bar Mythical Cre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20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20/world/asia/20briefs-CENSORSBARMY_BRF.html。
- 参見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www.guardian.
 co.uk/technology/blog/2009/mar/13/china-grass-mud-horse; http://news.bbc.co.
 uk/chinese/simp/hi/newsid_7940000/newsid_7948300/7948369.stm; http://edition.
 cnn.com/video/#/video/world/2009/03/19/vause.china.grass.horse.cnn等。
- ◎ 對這一群體的描述可參見胡泳:《眾聲喧嘩》,頁183-201。
- ® 參見〈山寨漢字你認識嗎?〉,《廣州日報》,2009年4月11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4/11/content_531535.htm。
- Stuart Hall, "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1976。轉引自赫伯迪格:《亞文化》,頁101。

王洪喆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生。